

流动人口语言变化的 社会语言学研究

武小军 著



科学出版社

流动人口语言变化的 社会语言学研究

武小军 著

2009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BYY015)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通过语言调查与统计、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流动人口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城市流入与回流等过程中,其语言状况与产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等相关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论证,并揭示出我国人口流动大趋势下的语言问题及应对策略。

本书可作为语言学专业学生的参考书,也可为其他专业的学生及社会人员提供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人口语言变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武小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03-046011-0

I. ①流… II. ①武… III. ①流动人口-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国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6693 号

责任编辑:李淑丽 刘巧巧 / 责任校对:郭瑞芝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华路天然工作室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2

字数:462 000

定价: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西方社会语言学者时常感叹，他们的国家从农业化社会转入工业化社会，历经一二百年，居然没有留下一些记录“社会转型与语言使用变化”方面的文献。

当下中国正在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只经历了 30 年，但城镇化率已经过半，全国已有 5 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与此同时，国内各种语言和方言出现了大接触、大碰撞、大交融和大变化的局面，传统语言版图也随之改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如此大面积的语言接触，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令中国社会语言学者庆幸的是，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以其高度的时代责任感、敏锐的眼光、多维的视角、扎实的调查、科学的分析，适时描述记录了当今中国流动人口或称农民工（或称进城务工人员）的语言状况、语言认同和语言变化，为大变革时代的语言变迁，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武小军教授的《流动人口语言变化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跟城镇移民不同，流动人口或称农民工是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流动人口进城务工，没有城市户口，而城镇移民则有城市户口；流动人口大多年年春节返乡，而城镇移民居住相对稳定，未必年年春节返乡；流动人口的语言状况和使用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之中，而城镇移民的语言使用模式已基本摸清。

如果说，近 30 年是国内人口流动时期，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二三十年，似可视为国内移民时期，出现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譬如，全国工业移民、新疆戍边移民、内地赴港移民、三峡工程移民等。这些不同的移民群体，代表的是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不同类型。

早期的工业移民，语言保持相对完好。他们从东北迁入内地某个城市后，其母语或母方言基本保持两三代不改变，在他们迁入的城市、小区或单位内，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母方言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戍边移民，语言使用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在北疆，兵团成员日常交往使用“淮河南话”，而不是普通话，移民第二代八成以上也都说“淮河南话”；但是，在南疆，兵团成员大都使用带有新疆味儿的普通话，移民第二代八成以上不会讲父母的话，原因之一是，他们幼年的普通话课程是上海知识青年老师讲授的。

从中国内地迁入香港的移民，发生了大面积的语言转用。1949 年至 1971 年间，内地移民特别是移民子女的母语都转用了“广府语”（即香港话），而不是标准语。可是，当时香港政府并未开展任何推广“广府语”的运动，也未出台任何类似的政策，这种较大规模的“语言转用”，基本上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迁往广东、江苏两省的三峡工程移民，日常交际使用原方言，但对



外交往,则使用带有浓厚口音的“地方普通话”。

当今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与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需要适应城市生活工作环境,调整家乡话、普通话及流入地方言的使用方式,完成再社会化过程。在该过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认同、方言和普通话使用均会出现一些变异或变化。由于流动人口的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和地域的转换,这种尴尬的生存境况,对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小军教授带领他的团队,选择北京、上海、宁波、慈溪(浙江)、广州、珠海、深圳、中山、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的流入人口,作为流入地的研究对象;选取四川方言入声区的回流人口,作为回流地的研究对象;选择1980年代及其后出生、上限年龄30岁左右的流动人口,作为新生代的研究对象。调查发现多多,学术亮点纷呈。

关于流入地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工作语言,以普通话(使用率为44.3%)为主,家乡话(21.3%)和流入地方言(12.2%)为辅。流动人口的闲暇生活语言是,普通话、家乡话、当地方言平分秋色,使用率分别为23%、28.7%和25.7%。流动人口的公共场所(超市、商店、饭馆、车站等)用语,以说普通话(使用率38.1%)为主,家乡话(15.1%)和流入地方言(19.4%)占有较少比率。

关于返乡回流地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在跨方言交际中,为了不影响对方理解,通常会改变一些常用入声字的读音,使方音更接近普通话的读音。譬如,一些入声字的韵母变读、中低元音舒化、韵母变读扩大、多音单音化,原多读音的字由白读音转变为更接近普通话的文读音,多音合一。不过,流动人口的返乡回流大大增加了方言的使用率,方言共同体的根基十分稳固,并未动摇。

关于新生代的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语言运用,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具有较强的差异性和适应性,他们多能根据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看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根据不同的职业说不同的话。他们对普通话的认同度日渐上升,对方言的评价渐趋下降。随着工作及生活的渐趋稳定,新生代更倾向于多用普通话、转说新方言。方言总体上呈衰减态势,但未衰亡,方言多在特定的空间和人群使用,在维系乡邻情感方面,仍能发挥重要纽带作用。关于城市化融入,新生代流动人口最感焦虑。调查显示,认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的,占68.5%;认为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的,占31.9%;认为子女入学仍存在困难的,占31.2%。

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象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产生而产生的,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流动人口的语言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着有关城镇流动人口第二代、第三代语言使用和变化的论著问世,期待着有关城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如山东的朝鲜族)语言使用和变化的论著问世,期待着有关城镇境外流动人口(如广州非洲裔人)的语言使用和变化的论著问世,同时也期待着有关中国城镇流动人口语言使用和变化的理论著作问世。

周庆生

于北京灵通观寓所

2015年11月12日

前 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人口跨域流动中的语言问题及对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09BYY015）的最终研究成果，是在原研究报告基础上经过修改完善形成的。

2009年，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本项目得以资助立项。至2014年项目结项的五年间，笔者紧紧围绕项目研究方案，深入、全面地对国外移民、国内人口流动及语言政策与语言实态变化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和研读。为保证语言调查的效度与信度，调查方案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得以逐步完善，为搞好四川入声方言区的语言调查，我们挑选出25位来自不同入声区的学生进行方言音标及调查方法的培训。整个调研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的一些重要的人口流入区域，含北京、上海、浙江（宁波、慈溪等）、广东（广州、珠海、深圳、中山等）、四川（成都等）、重庆、陕西（西安等）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收回问卷1356份，剔除废卷后，共获取有效问卷1029份，对产生的154350条有效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就四川入声方言区的语言调查，共产生了815份有效录音，课题组对每份录音中的47个人声字发音反复听音，对所产生的38305个有效数据标注音标，通过建立数据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笔者通过运用问卷、录音、访谈、网络、文献等不同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语言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客观、系统地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以保证研究成果可以准确地揭示我国流动人口语言现状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

本书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视角，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我国人口流动（务工流入、返乡回流）中的语言变化与语言规律，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诸问题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会带来语言的变化。而关注语言、关注社会语言生活，又可从中窥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站在社会语言学角度审视流动人口的语言变化以及对社会语言生活所产生的系列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顺应了国家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的工作目标；二是通过对流动人口语言现象的追踪描述，实施语言国情监测；三是通过揭示社会语言变化规律，为国家制定新形势下的语言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是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语言研究状况。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是人口流入与人口回流语言调查分析研究。第三部分（第五章）是美、澳、欧国家移民语言政策及启示。第四部分（第六章）是人口流动下的语言诸问题与影响。

本书由武小军拟定大纲并负责撰写工作的组织与协调。参与本书相关研究并作出富有成效工作的有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王庆、樊洁老师，西华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山述兰老



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的陈音稳老师，以及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张世英教授等同仁。全书由武小军修改统稿，陈音稳、张世英等承担了翻译工作。

在项目立项和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语言学学科规划评审组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西华大学科技处的关怀与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还要感谢江汉大学社会语言学研究王立教授，就课题调查问卷提出的修改意见及对课题研究中的无私帮助和教诲。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周庆生研究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苏金智研究员、郭龙生研究员对笔者撰写的研究报告提出的修改意见，三位专家在学术上严格要求、悉心指导，使笔者受益匪浅。感谢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商务印书馆周洪波编审、广州大学汪磊教授对本项目的指导与帮助。感谢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7级、2008级共25名本科同学参与课题的录音调研工作。感谢西华大学数计学院、管理学院、经贸学院、外国语学院、能源与环境学院、西华学院、建筑与土木学院等相关老师和同学对课题调研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感谢所有参考文献作者。感谢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和辛勤付出。正是有了来自各方的支持、指导、帮助、建议、鼓励和参与，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的撰写虽几经努力，但囿于能力和水平，难免有不足与疏漏之处。因此，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武小军

于西华大学

2015年8月8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与语言研究	1
一、流动人口概念界定	1
二、人口流动的历时特征	3
三、人口流动的共时特征	12
四、流动人口语言研究	16
第二章 流动人口在务工流入地的语言状况	19
一、调查设计与抽样	19
二、语言接触下的流入地语言环境	25
三、交际空间变化与语言选择	44
四、流动人口的语言认同与语言能力	95
五、流动人口语言运用特征与规律	105
第三章 流动人口返乡回流与地域方言变化	107
一、调查设计与抽样	107
二、回流人口语言变化及相关度分析	109
三、空间转移与语言选择	127
四、人口回流下的语言变化特征与规律	213
五、结语	215
第四章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語言选择与变化	217
一、调查设计与抽样	217
二、城市化融入下的语言环境及语言养成	224
三、交际空间与“三种话”观察	231
四、人口素质结构与语言变化	244
五、结语	253
第五章 美、澳、欧移民语言政策及启示	254
一、美国移民语言政策	254
二、澳大利亚移民语言政策	261
三、欧洲移民语言政策	266
四、对我国语言规划的启示	270
第六章 人口流动下的语言诸问题与影响	277
一、流入地语言交际环境与语言走向变化	277
二、方言消退与语言文化保护问题	279



三、东、中、西部语言发展的不均衡性与问题·····	281
四、语言和谐与流动人口素质·····	282
五、语言意识与城市融入阻碍·····	284
六、普通话“量变”趋势与语言服务·····	287
七、普通话与方言的包容性发展·····	290
参考文献·····	293
附录一·····	298
附录二·····	299
附录三·····	300
附录四·····	303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与语言研究

一、流动人口概念界定

本书的研究主体是我国的流动人口 (recurrent population), 研究脉线主要是流动人口在我国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区域流动, 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流动人口在我国区域流动过程中的语言变化及对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影响。因此, 本书有必要首先对“流动人口”的概念及相关内容进行界定和说明。

(一) “流动人口”有别于“移民”

“移民”这一称谓通常具有国际特征与含义,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 常将移民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进行区分。当人口离开本邦(国)前往彼邦(国)定居时, 这类移民即是空间维度上指称的国际移民 (international migrants)^①。国际移民组织^②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称国际移民是“为了在其他国家定居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联合国在 1997 年版《国际移民统计建议》中将之界定为“任何改变常住国的人”, 并且将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进行了区分。长期移民是指“移居非常住国至少一年的人”; 短期移民是指“移居非常住国达到至少 3 个月, 又短于 12 个月的人群”。并同时指出“为娱乐、度假、探访亲友、商务、医疗或宗教朝拜等目的而前往该国的除外”。除此, 在空间维度上还有一种“移民”, 即“国内移民” (internal migration), 指在一国内从本土迁往彼土定居的人口, 如我国的三峡移民等。从时间维度上看, 则有“精神移民”, 这种“移民”即是“从文化离散、人事流走、命运悬置开始的。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进入一种‘失根’和‘被迫’状态的人口”^③。这种时空维度上的区分常常也被迁移区域的标准所替代, 强调的是迁徙、定居等特质。孙敬之等认为“迁徙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 又称移民”, 并强调, 所谓“移民”是指“由于某种原因, 离开自己原来居住地, 而定居在他乡异土, 并在那里重建家园, 有的在本国内部迁移, 有的跨越国界, 加入住在国国籍”^④。而另一些学者则以“非定居”作为移民的定义标准, 因此, 其移民标准较为宽泛。例如, Boyle 等学者称“移民指越过政治或行政

① 林艳, 国内移民与社会公义——希伯来圣经《阿摩司书》和《弥迦书》新释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5): 22.

② 国际移民组织网站, <http://www.iom.int/cms/en/sites/iom/home.html>.

③ 钱超英, 流散文学: 本土与海外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7: 9.

④ 孙敬之, 郭振淮, 试论战后世界人口迁徙和移动的若干特点 [J], 人口与经济, 1981, (5): 9.



单元的边界,并至少居留一段时间”^①。还有一些学者则指出,移民在全球根本无法设立一个共同的判断标准,斯蒂芬·卡斯尔斯(Stephen Castles)说:“诸如此类的差别表明,对移民的界定毫无任何客观标准,一切取决于国家政策,而政策则是对政治和经济情况方面的需要以及对公众态度的反应。”^②

纵观以上表述,本书认为,移民通常反映出的是人口在空间移动中的跨境、移居等流动行为,和本书所述的“流动人口”有着很大的内涵差异。虽然两者都具有空间移动及受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驱动等共同特征,但流动人口不得不接受我国长期以来的行政制度影响,虽有空间移动但却无法真正实现其定居、迁徙、落地生根等的最终结果,这和诸如我国的三峡移民等形成了最本质的差异。虽然一些学者撰文将我国一些城市的“打工者”等同于“国内移民”,并称“它是‘移民’一词在更广意义上的使用”^③。但他们所指称的“打工者”包含两类人口:一类是那些早年而来并取得城市户籍的移民人口;一类是外来但尚无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将之统称为“国内移民,多少有混淆概念之嫌。本书认为,通常意义上讲的国内移民和流动人口”有相似之处,但其细微差别还是在于国内移民终究体现出的是移民和定居等的特质。

(二) 流动人口概念及相关内容

从公安部门颁布的人口管理条例到相关学者的研究表述,均可看出,在我国,流动人口的范围和内容较为固定。“根据我国国情,流动人口可定义为: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留、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也就是说,从动态看,流动人口是实现了人户分离的地区之间流动的人口;从静态看,流动人口是某一地区中没有该地常住户口而在该地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口,或是某一地区中有该地常住户口却不在该地活动、居住的人口。”^④参照公安部门出台的相关条例规定,本书认为,流动人口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流动人口包括暂住人口和迁移人口,暂住人口指在常住地以外的市、镇暂住时间较长、从事工商等经济活动的人员,一般不具有现住地的常住户口,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但必须进行相应的户口登记,一般实行来报走销的登记制度。迁移人口指离开原住地所在的户口管辖区而在另一地定居的公民,通常要履行户口迁移管理手续。狭义的流动人口则指在常住地以外的市、镇停留三日以内的人,一般不履行户口登记而履行旅客住宿登记。因此,本书对流动人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因工商等经济活动而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另一地暂住或迁移居住的人员,这类人员一般不具有迁入地(流入地)的常住户口”。

在我国,流动人口还有多种别名,如外来人口、暂住人口、寄住人口、短期迁移人

① Boyle P, Halfacree K, Robinson V. 1998. *Explor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 London,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② 斯蒂芬·卡斯尔斯,凤兮. 21世纪初的国际移民:全球性的趋势和问题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2001, (3): 22.

③ 林艳. 国内移民与社会公义——希伯来圣经《阿摩司书》和《弥迦书》新释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5): 22.

④ 王建民, 胡琪. 中国流动人口 [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3, 4.

口、两栖人口、自流人口等,近些年来,“农民工”称谓被广泛应用,集中显现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以农村户籍身份进入城市务工等的基本特质,这些说法无一不在说明我国流动人口流动的暂时性和非城市户籍性等重要特征。

二、人口流动的历时特征

“广义地讲,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人口的流动。”^①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历史上不同的社会时期,其人口流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一直持续,未有断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我国就“经历了三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是农村人口经自发或由政府组织,从内地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迁往边疆,成立农垦团屯垦戍边;二是因大兴水利,很多库区内的农民因土地、村庄被淹没而迁往他乡,易地而耕;三是“文化大革命”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三种类型的迁移人口约有三四千万之多^②。从历史角度看,这三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因对城市化并未产生积极影响,所以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流动。因此,本书所述的中国社会与人口流动的相关内容,仅限定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时期,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至2011年的中国社会历史时期。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历程已有38年,在这38年里,因改革开放而使国家变得富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跃发展,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全国范围内跟随资本和经济的流转而流转,由此形成的人口流动为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深层演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城乡之间: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总的人口变化趋向是:全国范围内的城镇人口呈逐年增加态势,相应地,乡村人口则逐年减少。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0年的49.95%,而至2011年,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已超过50%。相关数据显示^③,我国城镇化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在不到15年(1997~2011年)的时间内,城镇化水平由30%上升到51.27%,可以说,目前的中国,城乡人口分布格局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目前,我国人口流动总的趋势是,既有乡-城流动也有城-城流动,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并存,而以乡-城流动为主,在流动人口大军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

图1-1、图1-2列出了1978年到2010年城市和乡村人口对比数以及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数据^④,排除人口自然增加和自然减少等因素,可以看出,30多年来我国人口从乡

① 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25.

② 杨子慧,萧振禹.流动人口与城市化[J].人口与经济,1996,(5):36.

③ 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4.

④ 国家统计局网站普查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村流向城市的趋势从未停止。以农村户籍流动人口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自然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户籍所在地到达务工流入地，从低知识、低技能的基础劳动力逐渐蜕变为技术熟练、知识结构不断升级的产业工人，从而形成了我国完备工业体系中的最重要的财富。30多年来，农民工用高强度的劳动和低工资待遇的艰辛付出为中国由农业国高速发展为工业门类齐全的“世界工厂”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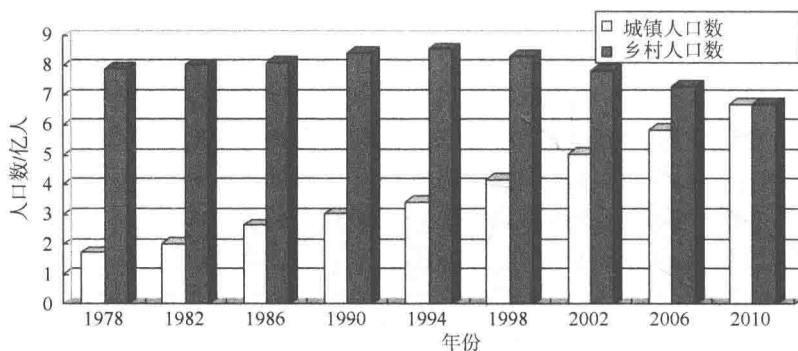


图 1-1 1978~2010 年城镇、乡村人口数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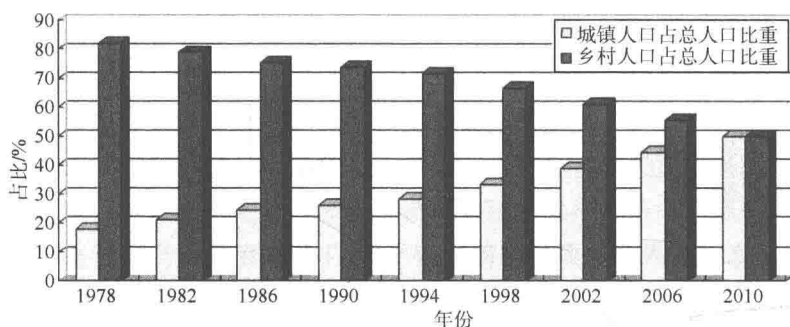


图 1-2 1978~2010 年城镇、乡村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人口经历了三次较大范围和规模及持续时间较长的人口流动，这三次人口流动浪潮对中国社会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1. 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护和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力。农民在种好田地的同时也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此时期，农民多安心于半农半副的生活方式，外出求生的农民不足 200 万人。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是：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离开土地但不离开乡土，农民以就近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就业目标。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厂进镇，在本地域内（如县、乡、镇）从事非农职业。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是通过就地转移来实现的。因此，在当时被称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新路”。在这条道路之下，转移过后的农民亦工亦农，仍居留在本乡本土，并未真正脱离农村，虽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不过这却是农业人口走向城镇化的开端。

1990 年统计数据显示^①，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住地与常住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人数，即流动人口数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广东、北京、广西、海南、江苏、四川、湖南、山西、福建、宁夏 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广东由 497 527 人增加到 3 791 002 人，增长了 6.62 倍，北京由 169 868 人增加到 602 131 人，增长了 2.54 倍。在人口流动背景下，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1987 年市镇人口与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由 21.13% 上升为 25.32%。其中，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由 14.4% 上升为 19.0%；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由 6.2% 上升为 18.1%。城镇人口比重的大幅度增加，反映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家建设的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在城镇人口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农业人口。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城镇总人口为 2.97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20.6% 上升到 26.2%。城镇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提升到 1982 年的 20.6%、1985 年的 23.71% 和 1990 年的 26.2%，城镇化率在不断提升（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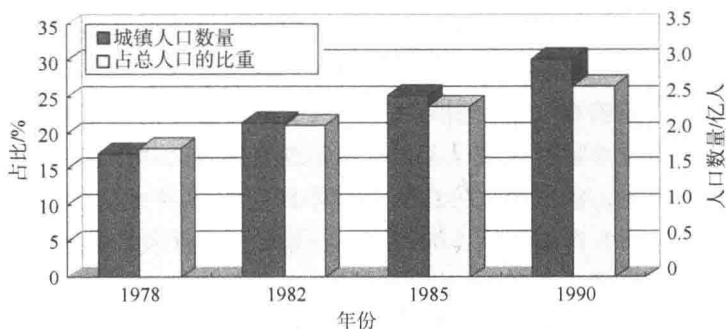


图 1-3 1978~1990 年城镇人口数及占总人口数比重

2.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城市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开。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无法再创造新的价值，在国家政策的默许和支持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数据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全国的流动人口约有 1800 多万人，而至 1990 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超过 2000 万人^②。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之后，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急剧增加，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后起的上海浦东、环渤海经济

^① 国家统计局.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75.htm.

^② 段成荣, 杨舸, 张斐, 卢雪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J]. 人口研究, 2008, 6: 31.



区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发展最快的地区,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跨区域的异地转移形成。

以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八大城市的数据统计为例^①,1990年,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成都、杭州、郑州八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已分别达130万人、131万人、71.78万人、75.46万人、91.42万人、42.59万人、50.38万人和37.4万人。同1984年相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5、4.6、5.7、9.9、5.7、5.9、15.5、12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73%、187%、261%、216%、183%、158%、202%和187%。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翻了一番多,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②。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是:异地转移,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

纵观这一时期,人口流动体现出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流动人口数量迅速提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人,增长势头迅猛。二是方向相对集中,主要向“北、上、广”等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但职业不再是农业生产,而转变为多种产业行业。在农民工的乡-城流动中,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工在城市流入中遭遇了身份的排斥,这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和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城市既需要他们又排斥他们。因此,农民工在经济、政治、社会与心理文化各方面都难以很快融入流入地城市,反而因老乡、亲戚等地缘、血缘关系结成了城市边缘的一个个社交群体,他们与原产地农村依然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人口城市化。

与第一个阶段相比,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已经离开本乡本土,流向遥远的异乡,在城市中形成了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同时也在户籍地或留下妻、儿,或留下父母,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并由此引发出关于“留守”等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显示,因人口流动,全国农村共产生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有4000万人。将此数据和2000年相比,发现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已高达28.29%。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留守儿童占47.14%,父母双方外出留守儿童占52.86%,且多集中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如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等省,仅这六省的农村留守儿童就占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总量的52%^③。留守儿童的增多和留守现状从另一侧面也深刻反映出了我国流动人口主要由中西部流出地向东部流入地大量涌入、靠打工获取经济收入的初始化特征。他们虽然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但却已经逐渐脱离原乡,其“流动”特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① 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42.

②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2008,(6):31.

③ 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妇运,2008,(6):34-37.

3. 2000年至2011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岁月的延续,进入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的内在群体结构开始发生改变。八〇后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占据流动人口的主体地位,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开始由第一代(老一代流动人口)向第二代(新生代流动人口)转换。由于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成长于父辈创造的环境之下,其教育程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预期等方面较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第二代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虽然身份仍然是农民,却不同于父辈们打工挣钱后就回家的务工目的,他们将生活定位于实现由农民向城市居民(市民)的身份转换。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特点是:转移定居,举家迁移,落地生根。

2003年,中央明确提出关于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问题,把农业剩余人口的流动问题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城镇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联系起来,不仅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要解决城市化进程和“三农”引发的一系列人口和社会问题。在以民生为本的人口政策和新形势下人口流动规律的双重影响下,我国农村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以长期居住为特征的举家迁移等一些新的流动趋势。

第二代农民工进入流动大军,流动人口从独自外出到夫妻共同外出再到举家外出,我国农村人口流动已呈现家庭化移民的趋向。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农民工举家外迁的有2470万人,比2003年增长1.6%,约占农村外出人口的20.9%。而从2008年至2011年,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呈现出异常明显的增长态势,2008年为2859万人,2009年为2966万人,2010年为3071万人,至2011年则高达3279万人^①。伴随着这种流动倾向,“流动儿童”问题又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表明,全国14周岁及以下的流动儿童约为1409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3.78%^②。至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推演显示,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人。这一数据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数量增长了424万人,5年间增长了30%^③。

流动人口的举家外出倾向,使我国的人口流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举家迁移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而使其有了更深刻的人口城市化含义。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当前,我国乡-城人口流动迁移正由第二阶段末期向第三阶段转变,其主要特征为:由夫妻外出务工经商,跨省跨区流动到在流入地站稳脚跟后,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目前,有近70%的流动人口与家人一起流动,在现居住地户均规模已达2.5人^④。流动人口的这种流向变化,除了使“农村呈现‘空心化’特征并带来‘人口的空心

① 国家统计局. 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② 段成荣,梁宏. 我国流动儿童状况[J]. 人口研究, 2004, (1): 53-59.

③ 段成荣,杨舸. 我国流动儿童最新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学刊, 2008, (6): 23-31.

④ 国家人口计生委.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6.

化’”^①特征继续加剧外，也造成了流入地城市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二) 区域之间：人口由西向东趋于集中

国家统计局历年历次人口统计数据表明^②，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总人口增加了3.78亿人，增长率为39.31%。其中，各个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增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更好地观察和比较，本书以年代分类，将最近30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口的增长概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2年到1990年；第二阶段为1991年到2000年；第三阶段为2001年到2011年。统计中，将各个地区的总人口增长率除去自然增长因素换算出该地区的外来人口增长率，通过数据分别比较列出了每个历史阶段外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10个地区，并通过有代表性的各地区的数据的增减来观察人口流动的趋势。

1. 第一阶段（1982~1990年）

图1-4排列出了这一时期外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前10个地区，由图1-4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外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前5个地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山东、天津、河北，其增长率分别是14.42%、13.78%、10.05%、9.21%、7.62%。同时进入前10位的地区还有河南、福建、湖南、宁夏和江苏。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由于1988年海南建省脱离广东，所以在数据上广东的人口数量不升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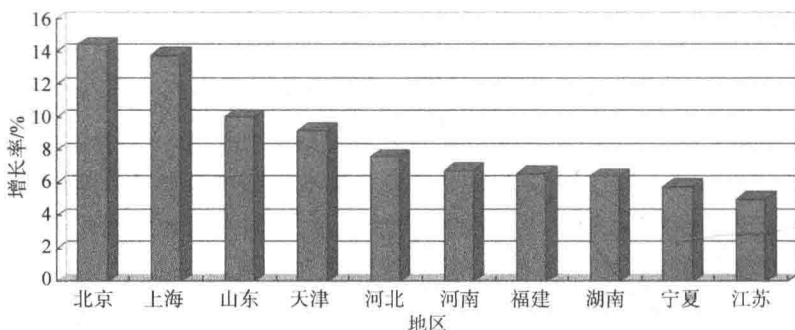


图 1-4 相关地区的外来人口增长率

由统计数据可看出，在这一阶段，吸引外来人口较多的地区都是传统的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的地区，如三个直辖市及周边地区，以及山东、福建、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除北京、上海等作为传统的吸收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托优质的教育条件吸纳大量读书就学人口以外，其他几个地区的外来人口增长率分布都比较均匀。在这一阶段，外来务工人员的分布尚未出现明显集中的倾向。

2. 第二阶段（1991~2000年）

图1-5排列出了这一时期外来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前10个地区，由图1-5可看出，这

① 周祝平，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人口研究，2008，(2)：45-52。

② 参看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人口普查公报”及相关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